

# 督促与配合:反轰炸中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

## ——以议案为中心的考察

向中银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组织慰问活动、谴责日寇的轰炸、对消防殉职人员予以表彰等方式凝聚起反轰炸精神力量;督促政府加强防毒与消防设施建设、增凿防空洞与加强防空洞管理、力主将人口疏散与疏散区建设相结合,从而使整个消极防空设施得到改善;督促政府机关健全救护组织、完善救护设施、加强救护力量,要求政府健全救助机构、增加救助经费、扩大救助范围、讲求救助实效,由此推动了空袭救护与救助的展开。

**关键词:**反轰炸;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80-06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之久的疯狂轰炸,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重庆人民顽强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略企图。学术界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研究已有了一批成果<sup>①</sup>,为深入研究重庆大轰炸奠定了基础。但作为重庆市的“民意机构”——临时参议会在反轰炸中的作用尚无专文研究,本文拟以议案为中心进行考察。

### 一、凝聚反轰炸精神力量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市临时参议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促进市政兴革起见”而成立,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产生不是由公民选举而是由国防最高会议选定,其职权为:“在抗战期间市政府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市临时参议会决议”;“市临时参议会对于市政兴革得提出建议案于市政府”;“市临时参议会有听取市政府施政报告之权”;“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于开会时有依议事规则向市政府提出询问之权”;市政府对临时参议会通过的议案“除呈经行政院核准免予执行者外应予执行”<sup>[1]3</sup>。可见市临时参议会“并非完全之立法机关,但亦与普通咨

询机关不同,而系一半立法机关”<sup>[2]12</sup>。1939年10月至1945年9月,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前后两届共举行大会11次,通过提案393件,对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决议案95件,对市民或市民团体请愿案件之决议案48件,均已先后送市政府执行”<sup>[3]36</sup>。临时参议会还对市政府各局处进行不定期视察并形成视察报告。除二届五次大会外,市临时参议会的10次大会均在抗战期间举行,针对日机的轰炸,市临时参议会通过了诸多反轰炸的议案和决议,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决议和通电等方式凝聚反轰炸精神力量。

首先是组织慰问活动。1940年,日本侵略者制定并实施了空袭重庆、成都的“101号作战”计划,重庆遭到了比1939年更残酷的无区别轰炸,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据统计,全年“人员伤亡9643人,其中死亡4232人,重伤5411人,损毁房屋6955栋、22197间”<sup>[4]102-103</sup>。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针对“敌机自五月起,迄最近止,不断袭击本市,尤以八月十九,二十两日,达其暴行之顶点,造成吾人

<sup>①</sup> 黄淑君主编:《重庆大轰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编著:《重庆大轰炸》,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曾小勇等著:《重庆大轰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谢世廉主编:《川渝大轰炸》,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重庆抗战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日)前田哲男著:《重庆大轰炸》,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勇主编:《重庆通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等。以上著作均未从市临时参议会的视角进行研究。

收稿日期:2008-12-05

作者简介:向中银(1962-),男,重庆合川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永不磨灭之印象”，相继采取了多项慰问活动：“（一）对空军将士……英勇作战之精神，表示钦敬，由会赠送锦旗，以示慰劳。（二）对空袭服务总队，防护团，消防队，水电两厂及电话局全体员工，能在敌机残暴轰炸下，克尽职责，由会分赠送锦旗并致函慰问。（三）推定陈铭德、周钦岳、漆中权，三参议员，赴被炸之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慰问。（四）派员分赴各医院慰问受伤市民。”1940年11月19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一届三次大会召开，在第一次会议上即通过并发出了“大会电慰保卫本市之空军及本市各防空救护机关团体电”，对“我防空救护机关团体，有我无敌，袭□鹏于长空，救死扶伤，扑□焰于大地，身冒万险，毅力弥坚，忠事之烈，谁能不敬，本会第三次大会全体议决，代表陪都七十万市民，谨电致慰”<sup>[5]31、22</sup>。1941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并实施了空袭大后方的“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等地实施疲劳轰炸战术，持续不断地进行轰炸，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便推进其南进战略。为了鼓励军民的反空袭斗争，市临时参议会展开了慰问活动。一届四次大会决定派参议员李奎安、苏太徐、连雅各“代表本会前赴灾区慰问并由秘书处起草慰问信”<sup>[6]10</sup>；其驻会委员会“函慰水电两厂员工及有关防空之各级机关团体”，因为“今年夏季敌机对本市施行恶性轰炸，警报数昼夜连续不断绝，而本市水电两厂□在此种艰难环境之下，昼夜赶工抢修，不断供给水电，便利市民生活”，有关防空之各级机关团体亦能尽其职守，因此分别致函“在精神上给以诚恳之慰劳”<sup>[7]29</sup>。

其次是谴责日寇的轰炸，鼓励军民坚持反轰炸斗争。1940年5月至10月日机的大轰炸造成重大损失，“本会既为民意机关，自应代表民意，通电痛斥敌机袭渝暴行（附录二），藉以发舒行都人民之抗战情绪，唤起国际之同情”，认为“敌人所以如此疯狂肆虐，倒行逆施，其目的在摧毁吾人之抗战意志”，市临时参议会明确表示“吾人当正告日本军阀，此种企图，绝对不能达到，重庆市民对于敌机之残酷暴行，无不切齿，在此种残暴轰炸之下，惟有引起吾人千百年不能消解之历史仇恨，吾七十万重庆市民，已早准备以最悲壮最沉痛之精神，接受敌机之轰炸，深信敌军阀迟早必须偿还其所负之血债”，敌人的暴行“决不能动摇吾人抗战之决心，吾人自当各守岗位，屹然不动，尽心竭力，以支持政府持久抗战之国策直至最后获胜而后已”，断定“日本军阀，即将偿还其无涯之血债”，因此“尚望全国同胞，努力以赴，并望国际人士，迅采有效行动，援助吾国，以击溃此人类之公敌”<sup>[5]30、32</sup>。与此同时，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发表谈话，谴责日军的暴行，“目前敌机无分昼夜，袭击重庆，每次均投掷多量之炸弹或烧夷弹，其目的在屠杀我非武装市民，及造成恐怖空气”。此种轰炸“与人类文明之原则，适相背谬”，“重庆市民断不能因敌机之威胁而失去一物，此物适为敌人久欲

剥夺者，换言之，即重庆市民，决不因空袭而动摇其坚强不拔之抗战意志是也。敌人在重庆所作之暴行，惟有限增强吾人敌忾同仇之心，此殆为敌机滥炸惟一之收获”，呼吁苦难之中的市民“以热情鲜血及忠诚之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更改”，他表示“敌人或欲妄图毁灭重庆，然吾人则深信重庆断乎不致沦为废墟，倘即成废墟，吾人亦必决心在此光荣之基础上，重建未来之光荣。余深信重庆乃不可征服者，亦犹全中国其他地区之不可征服相同，‘威武不能屈’，盖为吾民族数千年文化之传统教条，重庆市民正为此种精神之传统的承继者，敌人舍放弃其残暴行径外，实永不能达成屈服吾人之目的，且将自食无穷之恶果”，他特别称赞“市民所组织之团体，无不与政府机关切实协作，且能随时发挥救死扶伤之伟大同情心，即此一点，实值得特别颂扬”<sup>[8]</sup>。1941年5月，市临参会一届四次大会召开之际，重庆遭到日机轰炸，大会发出了《慰问五三被炸灾区市民书》，对市民在轰炸中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均能秉坚忍不拔之意志，抱牺牲为国之精神，以建设答复轰炸，以沉着应付暴行，用能废墟之上，重建新基，劫后陪都，屹然如故，此伟大之表现，实中外同钦”，并预见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凡我市民惟有忍本身一时之痛苦，谋子孙百年之大计，今后仍盼各在本来岗位，加强救国工作，奋发迈进，不稍懈怠，俾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今日之牺牲，换未来之代价，物质虽遭毁灭，历史永获光荣”<sup>[9]4</sup>。

再次是对消防职人员予以表彰，并入祀忠烈祠。市临参会一届三次大会通过了市政府交议的“为请将本市消防队殉职队长王海元徐剑二员入祀忠烈祠”议案，因为王海元和徐剑在1940年8月19日的空袭中，“督率队员，立即出动，冒险抢救，□遭炸毙，其忠勇义烈舍己救人之精神，洵堪矜式”，市临参会决议：“王海元徐剑两故员，忠勇殉职，应加表彰，即请由市府在成仁地点，或繁华通衢，建碑纪念，以彰忠烈，而示励来兹。”<sup>[5]57</sup>

## 二、督促改善防空袭设施

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限制了防空能力的提升，难以有效地阻击日本飞机的轰炸，因此减少空袭损失的主要途径就是建立和完善消极防空体制。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发挥民意机构的作用，督促市政府采取措施改善消极防空设施。

一是督促政府将人口疏散与疏散区建设相结合。随着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口增长迅速，由1936年的33万人增加到1939年的70万人，每年5月至9月间，因失去雾季的保护重庆成为日机的轰炸目标。减少市民伤亡的办法就是及时疏散。市临参会成立后高度重视人口疏散问题，在通过的议案和对政府的决议中，主张将人口疏散与疏散区建设相结合，该办法不但能使市区人口疏散，而

且能稳定疏散到市郊的人口,这对于减少空袭伤亡和扩建重庆都极为重要。1939年10月,在市临参会一届一次大会上由吴泽湘代表市长贺国光所作的《市政府施政报告》中,虽然认为“数月以来,市民自动疏散及强迫疏散者,约占总数三分之二”,颇有成绩,但也坦陈“惟人民因生计关系,间复时去时来,虽经严格检查取缔,而户口异动率仍较平时不啻倍蓰”。对此参议员汪云松等提出了“扩大疏散区域及整顿疏散区交通案”,认为“本市市区人烟稠密,地位重要,久为敌机轰炸之目标,故疏散与救济两项工作实为本市市政当务之急”,主张:“扩大疏散区域以减轻敌机之威胁”;拟定计划改善治安、卫生、教育、交通状况并“使疏散市民各安其业”<sup>[1]62,41-42</sup>。鉴于疏散问题的严峻,1940年1月19日,市长吴国桢出席市临参会驻会委员会第11次会议时表示“本市市民为求安全计,有急行疏散之必要,惟疏散后之治安居住交通给养等问题,均须积极设法解决,甚望参议会方面多所协助,并盼提供具体意见”,于是临参会推举文化成、李奎安、汪云松分别拟具意见经议决后提交市政府,其主张为:治安方面健全旧有的江巴防护委员会、各联保和各保应设临时防护协助员、清查户口等;居住方面“除营建区所建住房先行安插外,其余迁乡人民应择交通便利地段佃屋居住,如无熟悉亲友,由该地保甲长介绍安置,各房主不得高抬房价,应由县长令各保甲长切实遵行”;交通方面“应由政府负责办理,于各疏散区增加交通工具,其不通车地区应规定力夫价值,俾免勒索”;给养方面“由政府于各疏散区内组织消费合作社用资给养”<sup>[10]34,38-39</sup>,这些意见和建议得到市政府采纳。此后市临参会继续关注疏散和疏散工作。市临参会《视察重庆市卫生局报告书》认为“疏散区域内医师缺乏,应促使本市医师赴疏散地区,以应需求,尤以唐家沱疏散前往之市民将日益增多,卫生局应设立一诊疗所”<sup>[10]45</sup>;江巴两县划入市区后治安问题突出,参议员陈铭德等认为“目前正在疏散期间,市郊治安,尤宜注意,否则,人民恐乡居难获安全,势必逗留城中,影响疏散前途,至为重大”,因此建议特别训练市郊警察,“藉维市郊治安,而利市民疏散”<sup>[6]35</sup>;临参会一届四次大会在《市郊外营建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案中,要求其在黄桷垭所建的30余栋平民住宅附近修建防空洞,以利疏散而来的老弱妇孺躲避空袭<sup>[6]71</sup>;即使到了1943年,参议员仍然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惨痛教训,尽管此后市政府营建了用于疏散的唐家沱、黄桷垭两市场和数处平民新村,但“本市人口不断增加,平时即有房荒之感,现在值雾季消逝,诚恐敌机来袭,疏散市民,无屋可觅”,于是建议向四行贷款一千万元“在郊区再建简易房屋若干处,以便此后疏散市民有所居住”<sup>[11]71</sup>。

二是建议政府增凿防空洞与加强防空洞管理。据统

计,截止1944年12月,重庆市共凿防空洞1825洞,其中公共防空洞284洞、私有防空洞1541洞,总共可容纳444968人<sup>[12]32</sup>。市临时参议会作为民意机构当有督促之功。临参会各次会议关注的重点在增凿防空洞、改善洞内设施、加强防空洞管理等方面。1939年10月,城内仍有30余万人口而防空洞仅能容纳11万余人,对此市临参会一届一次大会通过了周钦岳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及时从速增凿防空洞,并改善其设备,以策安全”议案,要求:“由市府会同防空司令部呈请中央拨发巨款,交由防空工程处,于此冬季中增凿防空洞若干,最低限度统计已成新凿诸洞,务须达到能容二十五万人以上之容量”;改善洞内设施,包括加固、通风、座凳、厕所、“防毒设备、救护医药亦应酌为备办”;留寓市民分区指定就近进入某区某号防空洞;防空洞的管理应交各区警察负责,因为警察“对于本区住民比较熟悉,易于指导管理”<sup>[1]51-52</sup>,1941年该建议得到落实。大会对“‘警察局工作报告’之决议案”中指出:市内防空洞的设备“及秩序尚多缺点,对于市民之卫生及安全,均有妨碍,宜设法于短期内积极改善。至取缔色彩显著建筑物,尤须从速办理,以策市民安全”<sup>[1]67</sup>。市临参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了汪云松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市政府商同防空司令部调查本市公私厂家已有之开山机器,飭令出租,以便现时增凿之各防空洞克期早日完成案”<sup>[10]87</sup>。一届三次大会通过了李奎安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加强大隧道及公共防空洞管理并增加卫生设备以策安全案”,指出“本会第一次大会,曾有改善防空洞设备之决议,市府已部分采择施行,惟尚有未予实施者,盼从速举办”<sup>[5]64-65</sup>,应从打扫卫生、排除积水、安装电灯和通风机等设备、准备饮水医药入手。大会对市警察局提出批评,“本市公共防空洞,或积水成潦,或尘土没胫,警察局工作报告中,所称清除洗净,事实上尚未做到,且有少数防空洞,危石欲坠,安全可忧”,应设法解决;要求卫生局对长时间不用的防空洞“应有计划的予以消毒”<sup>[5]79,81</sup>。一届四次大会通过了李奎安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市府商同防空司令部,无论公私防空洞于紧急警报后,不得拒绝行人入内躲避以重民命案”<sup>[6]61</sup>。1941年6月5日,由于日机的疲劳轰炸、防空洞管理疏漏和临场处置失当等原因,造成了“大隧道窒息惨案”,市临参会驻会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要求市政府查清原因与真相、追究责任、从优抚恤、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会议代表又“前往出事地点视察及慰问被难市民家属”<sup>[7]29</sup>;临参会议长作为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事件调查;6月13日,市临参会举行谈话会,要求各参议员尽量搜集窒息惨案实际材料和防空洞改进意见,调查伤亡人数,“务期本案真相大白,责任判明,以纾民愤”<sup>[13]2</sup>,据笔者所见档案,市临参会不久即收到沈钧儒等10件相关材料并以公函方式转到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市临参会迅速行

动所施加的压力,对案件的调查处理和加强防空洞管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后重庆防空洞的建设与管理划归市政府,防空洞工程处和防空洞管理处分别向市临参会作工作报告,市临参会在决议中要求其加强对私人防空洞建设质量的监督、城区附近沿马路一带多开防空洞、想方设法使市民方便进入防空洞等<sup>[7]68</sup>。

三是促使政府加强防毒与消防设施建设。1940年10月,重庆市政府开始设立防毒指导员,举办防毒训练班,但市民的防毒意识不强,防毒知识缺乏,防毒设备很少。对此市临参会一届五次大会通过了漆中权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市府注意本市防毒设施案”,认为敌机之所以尚未向重庆投毒,“或以外侨甚多,敌倭不能不有顾忌耳,今则浙赣一带,敌机已有试投毒气之情事发生,而欧美大邦,向敌倭宣战者二十余国,此后敌机对于本市是否将施最无人道之暴行,诚属疑问”,因此必须做好防毒准备,具体办法有:“(一)请市府将预防敌机施毒之简易办法,再行晓谕市民。(二)市府多备防毒用具与药品,发给市民,或以最低廉之价格分售。(三)请卫生局对防毒施诊医生,预作合理之分配,以免临时调遣不及。(四)请市府通告各保甲,遇敌机投掷布片零物时,立予毁灭,严禁拾取。(五)对本市救护人员应常加防毒训练”<sup>[7]52</sup>;大会对卫生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其购置“简单防毒设备”,“防毒药品,亦应注意储备”<sup>[7]67</sup>。随后参议员组成市政视察卫生组进行防毒准备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市卫生局在防毒气的口罩质量检查、对飞机投下可疑物的查验、防疫菌方面颇有成绩,特别是“已准备大量鼠疫血清及消毒药品等,必要时可使全市市民一律举行防止鼠疫注射,该局除令传染病院准备收容外,同时立翻印‘防止鼠疫实施办法’,分发各医护人员阅读”,但视察报告指出“防毒防疫救护等不仅经费应有增加,即药品方面亦应有所存储”<sup>[14]33-34</sup>。尽管敌机最终没有实施投毒,但市临参会对防毒工作的高度重视并非没有必要。

重庆市区的建筑屋多为木质结构,容易发生火灾,敌机轰炸时故意使用烧夷弹引发大火,导致市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在市临参会的督促下火巷相继开辟、消防设施不断改善。1939年4月,重庆市政府工务局即开始在市内繁华地段实施太平巷工程,“五三”、“五四”大轰炸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则加速了工程进度,市临参会积极支持这一工程,一届一次大会对工务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本市开辟火巷,经兵工协助,如期完成,当局措施有方”,但还不完善,因此建议“凡房屋栉比之处,尚□继续折让,以期减少灾害”<sup>[1]68</sup>;该次大会对警察局工作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消防是本市要政,警察局“既拟有扩充消防组织及添购消防器材计划,务期早日实行,以增强本市之消防力量。此外如增设水椿,尚应施以精确之调查后,赶紧添设,以备不虞之需”<sup>[1]67</sup>;有关加强消防设施的决议得

到认真执行,因为市政府向市临参会一届二次大会所作的“施政报告”罗列了消防工作的成绩,“购八十五万匹马力邦浦救火车一部,十四匹马力救火机六部,考必林一百二十套,帆布水缸八个,水带二千四百尺”,而且注意储备救济用水,“除督伤市民一律设置沙包水缸,淘修市内原有太平水池一百二十四口,水井七百二十二口,及伤自来水公司添设消防水椿十余处外,并由警察局会同消防联合会查勘市内修凿蓄水池地点”<sup>[10]</sup>。以后各次大会的政府施政报告几乎都有消防设施改善的内容,至1943年4月召开的市临参会二届一次大会,在对“警察局工作报告之决议”中仍然要求进一步改善消防工作,“消防组训,虽已加强,但器材缺乏,应立即补充,对于蓄水方面,亦应注意”<sup>[11]93</sup>。

### 三、推动实施空袭救护与救助

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并导致很多人流离失所,空袭救护与救助的任务极其繁重,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决议、市政视察等方式推动市政府采取措施加强救护与救助工作。

首先是督促政府机关健全救护组织、完善救护设施、加强救护力量。敌机空袭期间承担医疗救护工作的机构主要有1939年下旬市府联合各卫生机关组成的医护委员会和由市卫生局派员担任队长的重庆市防护团救护大队,医护委员会下设有重伤医院、救伤站、救护队和担架队等组织,救护大队下设四个中队,防护团在各区设有分团,各分团下设七班。市临时参议会一直关注着救护组织的建设,多次指陈其弊并要求改进,如1943年4月,市临参会二届一次大会关于《对市防护团工作报告之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防护团救护及工务大队,均欠健全,人数编组,亦不确实,应切实整顿,以期完善”;而“救护大队,向不足规定名额,民间不无指摘,应迅予补充”<sup>[11]97</sup>。市临参会的决议引起市府的重视并迅速得到改进,同年11月市政府向市临参会二届二次大会所作的“施政报告”即列出了市防护团健全救护队组织的三项办法,并要求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公司、行号分别建立“防护特别分团”<sup>[15]72</sup>并加强防护训练。在市卫生局向市临参会所作工作报告中均有救护设施获得改善的信息,从1940年4月到1941年12月,医护委员会所辖重伤医院拥有的病床由650张增至1057张、救伤站由九处增至34处、抢救设备不断增加,救护治疗程序逐渐规范<sup>[10]63</sup>。但市临参会一届五次大会后派出的市政视察卫生组仍然认为有必要继续改善,“陪都人口既众异动亦繁,兼以轰炸时之堪虑,防毒防疫救护等不仅经费应有增加,即药品方面亦应有所存储,平价发售药品仅只一处,亦宜设法增加。市民医院,尤应积极扩充,设备亦应力求完善”<sup>[14]34</sup>。市临参会二届一次大会不仅通过了温少鹤等参议员提出的

“市民医院应增设病床，并请市卫生局另辟局址，以增医院病床案”，而且在“对市卫生局工作报告之决议案”中批评卫生局，“扩充市民医院，此事叠经本会决议，均未能办到，卫生局应迅速筹设病床，以应需要”<sup>[1]71-96</sup>；半年后的1943年11月，市政府向市临参会报告：“本市市民医院，病床年来颇有扩充”，城内总院和唐家沱、南岸两分院的病床已增至150张，“本年复经本府拨款二十七万元，补充设备并添设病床”<sup>[15]76</sup>。尽管市临参会对救护设施改善进度不满意，但对市卫生局在空袭救护中的表现却予以充分肯定，“卫生局对于空袭救护工作，颇能尽其职责，市民交赞，今后尚望努力向前”<sup>[5]81</sup>。市临参会提醒市政府若要充分调动救护人员的积极性，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防护人员生活艰苦，亟应设法改善”<sup>[14]73</sup>。

其次是要求政府健全救助机构、增加救助经费、扩大救助范围、讲求救助实效。重庆自遭日机轰炸以来，灾民流离失所，急需救济，为此国民政府拨救济专款一百万元，并成立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举凡救护掩埋医疗赈贷抚恤诸端”为其职责，市政府改组救济院，设立养老残废所和儿童教养所；市临参会一届一次大会对社会局工作报告进行审查后认为：“本市各项救济工作，在组织上原极散漫，而经费多赖捐募，又无的款，管理者率多因循敷衍，不惟难期宏效，甚且愈趋愈下。根据报告书，特作如下之结论：一，救济院所属之各所，拟请市政府社会局设专司直接管理，以免迂回迟缓之弊，而增加救济工作之效率。二，救济经费，既不充足，在分配上，今后拟请尽量用于事业费方面；至行政费，则应尽量节撙。三，对各救济事业之工作人员，拟请社会局随时督责考核，免致松懈差池”<sup>[1]62-63, 66</sup>。由于轰炸等因素造成庞大的需要救助的人口，而经费的缺乏又难以满足救助需要，市临参会不断呼吁政府设法予以解决，市临参会一届三次大会对社会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救济院以经费支绌，已减少收容二百名，今后甚愿市府能扩充救济经费，收容量纵不能有所增加，亦不当再有缩减，对于院中收容之残老，应求其不饥不寒，收容儿童，厚为教养，除应不饥不寒外，尤不当其游手好闲”<sup>[5]78</sup>；而且“救济院无充分之款办理，只靠士绅捐款，为一重大缺点，今后应请妥筹的款，切实办理，以期收得更大之效果”，“公益救济范围甚广，而目前社会局以此项经费太少，办理未臻完善，今后应请增加经费，认真办理”<sup>[1]91</sup>。市临参会特别重视对流浪儿童、失业妇女和贫病民的救助。1941年5月，市临参会通过了陈铭德等参议员提出的“请市政府对流浪儿童弃婴乞丐等加以救济教养而重人道案”，要求：“扩充乞丐收容所尽量收容乞丐”，“调整原有之儿童教养所，或增设教养院，尽量收容流浪儿童”，“设立育婴堂保育弃婴”<sup>[5]52</sup>。市政府决定增加收容乞丐100名，调整救院儿童教养所，充实育婴，由警察局拟具收养“空袭流浪儿童”1000名的

“计划及预算，呈请核办，现在一面查勘所址，一面着手收容”<sup>[7]60-61</sup>。市临参会二届一次大会后，派出了市政视察警政组，对警察局所办的流浪儿童教养所进行视察，参议员“对该所现有之设施及教养人员之服务精神，均甚感满意”<sup>[15]44</sup>，但从培训流浪儿童掌握自立技能而言，其设备仍显不足。于是温少鹤等参议员提出了“请就娱乐场剧票项下附带募捐二百万元以一半拨交重庆市浮露尸棺与运埋委员会购置棺木，以一半拨交流浪儿童教养所购置儿童服装及生产设备器材案”<sup>[15]81</sup>，该议案交社会局负责办理，“前款百万元，经已分期拨交济用”<sup>[16]80</sup>。抗战爆发后，不少妇女从沦陷区流浪到后方，有的妇女遭敌机轰炸身体伤残，这些孤苦无依之妇女急需救助，对此李秀芝等参议员提出了“请设立失业妇女教养院以增加抗战力量案”，教养院“设法介绍职务，或施以短期技术训练，籍为国用”<sup>[11]72</sup>，但市政府以经费难筹暂缓设立回复参议会。敌机轰炸造成市区贫病民的急增，他们缺医少药，需要积极设法救助，因此市政府向市临参会一届四次大会提交了“请发动全市中西医施诊慈善团体施药及提倡募捐五十万元设立简单医院救济贫病民众案”<sup>[6]53</sup>，临参会修正通过后交卫生局办理，而卫生局“协同社会部市党部发动中医施诊及设立中医诊所义务诊治、至于提倡募捐设立简单医院一节，因当时忙于空袭救护及防护工作，未立即筹办”，其变通办法为“已委托市民医院增加免费病床，收治赤贫病人”<sup>[7]61</sup>。由于战争的长期化，导致物资短缺、通货膨胀，救助经费的增长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灾民的需要，作为民意机构的市临参会当然要督促政府解决救助经费和提升救助成效，在市临参会二届二次大会上参议员对社会局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公益救济，为近代都市社会重要工作，历次报告中，当局均以经费困难，仅有‘整顿’‘充实’‘改进’‘筹设’‘注意’等字样，甚少显著成效，今后尚望讲究实际，表里并重，以达成公益救济之真正目的”，具体而言，“救济院与游民教养院伙食费太少，被褥又不齐全”，“育婴所虽告成立，办理未臻完善”，“救灾恤贫及施棺施茶工作，尚嫌未能普遍做到，应力求加强”<sup>[15]99</sup>。市临参会施加的压力促使市政府采取行动予以改善，经数月的努力，市政府“已筹得捐款，约一千八百万元”，随即拨付给负责救济的院所，“以上共计拨付一千五百二十万元，在今日物价情形之下，此数目原不太多，但在本府却已尽相当能事”<sup>[16]47</sup>。

从国民政府设计的参议会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观察，它是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促进市政革新起见”而成立，且抗战的特殊环境需要一个能调动各种资源以应对变局的强大政府，因此市临时参议会不可能对市政府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但临时参议会既然是以民意机构的面目出现在地方组织架构之中，而民意机构的当然使命就是要及时发现政府施政中的问题并提出意

见和建议,所以正常运转中的临时参议会必然会对政府施政进行监督与制约。反映在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组织慰问活动、谴责日寇的轰炸、对消防殉职人员予以表彰等方式凝聚起反轰炸精神力量;督促政府加强防毒与消防设施建设、增凿防空洞与加强防空洞管理、力主将人口疏散与疏散区建设相结合,从而使整个消极防空设施得到改善;督促政府机关健全救护组织、完善救护设施、加强救护力量,要求政府健全救助机构、增加救助经费、扩大救助范围、讲求救助实效,由此推动了空袭救护与救助的展开。市临时参议会与市政府在坚持抗战、反对轰炸、稳定大后方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反轰炸工作,但从临时参议会角度视之,仍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市临时参议会的主要贡献在于代表民意督促与配合市政府采取应对轰炸的有效措施,这种督促与配合是以审查市政府施政报告并做出决议、提出议案及审查执行情况、向市政府官员提出询问并要求答复、派出市政视察组并提出视察报告等方式体现出来的,尽管市临时参议会权力有限,但市临时参议会及其驻会委员会的经常性监督,仍然让市府各局处的官员感受到了压力,促使他们设法执行临时参议会做出的相关反轰炸的议案和决议。

#### 参考文献:

- [1]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记录[M]//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152.
- [2] 重庆市档案馆. 两年来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J]. 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2).
- [3] 重庆市档案馆.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六年两届经过概要[J]. 档案史料与研究,1997(2).
- [4]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重庆市防空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5]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152.
- [6]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204.
- [7]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五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227.
- [8] 重庆市民抗战意志坚定,不因敌机滥炸而动摇——市临时参议会康议长谈话[N]. 新蜀报,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3).
- [9]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慰问五三被炸灾区市民书[M]//重庆市档案馆藏财政局档.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四次大会会议集卷. 全宗号:0064,目录号1,卷号562.
- [10]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147.
- [11]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202.
- [12] 本市公私防空洞概况[M]//重庆市档案馆资料室藏. 重庆要览. 政务类900.
- [13] 参议会搜集有关隧道窒息惨案实际材料[M]//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566.
- [14]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六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234.
- [15]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198.
- [16]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纪录[M]//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参议会档. 全宗号:0054,目录号1,卷号193.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Supervision and Cooperation: a Study on the Chongqing Provisional Council During the Anti-Bombing Struggl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Bills as the Focus

XIANG Zhong-y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bombing struggle,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of Chongqing cit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They organized many social movements to cheer up the spiritual power of anti-bombing camp, such as consoling the wounded, condemning the brutality of the Japanese invader, and honoring the killed men fire etc. Meanwhile, they also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fire control facilities, sped up the digging of air-raid shelters, he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air-raid shelters management, and combined the personnel evacuation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vacuating districts. They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 social relief movements. They pushed th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ambulance organization, to improve the medical rescue facilities, to reinforce the manpower of social relief section, to increase the input of governmental funds and to enlarge the scope of social relief acceptor. Due to these efforts, the medical rescue and social relief could be established much more smoothly.

**Key words:** During the anti-bombing struggle;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of Chongqing; important role